

李淼 科学思维可以变得更有趣

记者 郭晓莹



李淼

从小培养科学素质
家长提供宽松环境

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,李淼对科学启蒙有独到见解,他说:“我儿子小时候对恐龙很感兴趣,每次去书店或游乐场,都会跑到‘恐龙区’。那时他还不认识字,却盯着恐龙书籍上的画面喃喃自语,自己编故事。高中毕业时,他想学古生物或考古专业,可惜被他妈妈拦住了,原因是担心以后长年在野外工作,太辛苦。最后他拗不过,选择了经济学专业,如今在华尔街工作。假如当初尊重儿子的兴趣爱好,也许他可以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。”

而对于女儿,李淼和家人给了她更多的自由。“我女儿小时候也喜欢生物学,高考时被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,但读了一年之后,她放弃了,申请去国外读生物学专业,然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了博士,又去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后,进入一家生物投资公司,如今是投资部门的负责人,跟生物学挨边儿了。看到女儿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,我感到特别欣慰。”

李淼认为,科学素质要从小培养,家长的作用是提供环境,而非强行引导。“家长把孩子带到书店、玩具店、博物馆、科技馆这些地方就行,小孩子会自己挑出最喜欢的东西,千万不要过度引导。他们最喜欢的往往就是自己最擅长的,不要毁掉孩子的创造力。”

他至今记得,多年前有一次带两个孩子去科技馆,儿子直奔恐龙化石展区,女儿则在生物标本区挪不开步。“这种自发的兴趣,就是最好的老师。”李淼还以比尔·盖茨和马斯克举例,“他们小时候肯定也有各自的兴趣点,所以才能在各自热爱的领域取得成绩。兴趣就像火种,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,就能燃起熊熊烈火。”

近几年,李淼还出版了散文集《童年的小宇宙》。这本书和物理学无关,不是科普读物,而是他童年的成长经历,“算是把我小时候对文学的爱好又捡了起来。”写作过程特别顺畅,一个半月就完成了,因为都是他熟悉的故事。“写着写着,那些原以为早已忘记的童年,一一浮现出来,就像打开了一个装满宝藏的盒子。”

童年往事令李淼难忘。有一次他到河边游泳,用自己的救生服和小伙伴换了一条鲫鱼,结果回家后被母亲罚跪。大概过了半小时,母亲才消了气。“现在回想起来,觉得自己当时真的很任性,但这份对自己喜欢的事物的执着,一直伴随着我成长,也让我受益匪浅。”

生活中,李淼有很多爱好,喜欢养金鱼、放鸽子。“看着金鱼在鱼缸里游来游去,鸽子在天空中展翅飞翔,我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。”这些爱好让他身心放松,感受到生活的乐趣。当创作遇到瓶颈,他就坐在鱼缸旁,看着金鱼游动,有时灵感真的会在一瞬间冒出来。

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,比如出版社的编辑朋友,李淼可能会成为话题主导者,聊得很兴奋;但没有共同语言的人聊天,他就变得沉默寡言。“我觉得社交就像一场化学实验,只有遇到合适的试剂,才能产生精彩的反应。一旦和懂科普、爱文学的朋友交流,我总有说不完的话,我们会讨论最新的科学发现,分享创作心得,对我来说,这种思想的碰撞是一种享受。”李淼说。

跳出翻译本身
进入二度创作

今天我要谈到的两位翻译家——李文俊先生和郭宏安先生,都已经去世了。李文俊先生退休前一直是《世界文学》的主编,他翻译了很多英美文学作品,尤其以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最为著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他的译作是中国现代派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文学源泉之一,他作为翻译家,以一己之力为中国作家创造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现代小说话语。余华、格非在不同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,一位翻译家对中国作家的写作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,是不得了的事。

但是我们看到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本《老人与海》,译法并不是特别现代。这部作品是别人约他翻译的,他几乎没有推辞就答应了,为什么?这里面有一个故事:1951年,海明威在古巴写了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;1956年,中国的《世界文学》翻译发表了这部小说。李文俊先生曾说,当时他们编辑部一位俄文编辑看到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俄文版《老人与海》,便推荐了这部小说。编辑部把翻译任务交给朱海观先生,他是李文俊先生的前辈。小说在《世界文学》发表的时候,李文俊先生是责编。

常见的红绿灯为切入点:“下大雾时,我们在远处可以看到红色的光,却看不到绿色的光,这是因为红色光波比较长,大雾里的颗粒拦不住它,而绿色光波的穿透力不够。因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交通信号灯要用红灯表示停止。”

李淼常在科普文章中融入科学家的人生故事。“丹麦籍科学家尼尔斯·玻尔是量子力学创立者之一,我讲他用气压计测量楼高的故事,通过测量气压变化来计算高度,既有趣、又能体现科学思维。有时我还会加入一些戏剧性的情节,比如想象玻尔在测量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状况,他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了问题。”

他甚至会有一定的依据之下适当杜撰,比如他讲“泡利不相容原理”,就编了一个故事: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沃尔夫冈·泡利在现实生活中很爱跳舞,跳舞都是男女两人一组,他由此联想到量子力学里的不相容原理。李淼笑言:“这个故事虽然是我编造的,但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不相容原理。”

在讲解激光原理时,李淼以雪崩现象作类比。“大家可能见过雪崩,在滑雪时有可能会遇到,扫扫房顶积雪时也会遇到,扫着扫着,突然整个房顶的雪一下子都落下去了。这就是支点作用,一小块雪片带动两块雪片,两块雪片带动四块雪片,四块雪片带动八块雪片……最后形成了雪崩。而激光的原理也是这样,通过激发,产生连锁反应,让能量不断放大,所以激光功率比普通光强大得多。”他以文学的手法描述雪崩发生时的震撼场景,让读者在脑海里产生画面,再解释激光如何像雪崩一样,实现能量的爆发式增长。这样一来,复杂的原理就变得容易理解了。

专注于物理研究
但从未疏远文学

李淼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。他喜欢读小说、诗歌,初中时写过古典诗词,深深感受到文字的魅力。1976年夏天,唐山发生大地震,当时李淼生活在北京,和许多人一样,他与家人也在在油毡搭建的防震棚里住了半年。“我在防震棚里复习功课特别上瘾,还看微积分。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,学习成了我最大的精神寄托,每晚借着烛光看书,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,感觉特别充实。”

1978年,恢复高考第二年,16岁的李淼作为高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,考入北京大学。他回忆:“家长觉得学理科更好,而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,于是就选择了物理专业。”

他在班里年龄偏小,一开始成绩中等,慢慢地才赶了上来。有一次理论力学考试,他觉得考题不难,两个课时的考试时长,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提前交卷了。而由于很多同学没答完,老师延长了考试时间。那次他考了99分。但也遇到过挫折——本科时,他想学量子场论,太难了,读了一半实在读不通,只能放弃。那段日子他很沮丧,觉得自己能力不足,但后来逐渐明白,有些知识是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理解的。

北大毕业后,李淼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硕士、博士,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

就有的,还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各语种的翻译家们构建出来的?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

鲁迅先生特别讲究翻译的忠实,所以他有一种硬译、死译的方法,比如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,我们现在还是喜欢用他翻译的“死魂灵”这个名字。俄语中有一个词是“灵魂”,农奴主家里有很多农奴,每个农奴也是一个灵魂、一个单位,《死魂灵》写一个人去买这些死去的灵魂用来抵账。曾有一段时间,我们想把它翻译成“死丁”,但舍不得鲁迅先生的这个译法——把“灵魂”颠倒一下,变成“魂灵”,再加上一个“死”。“死灵魂”肯定是不通的,也不美,“死魂灵”就很漂亮,这个书名被固定下来。

现在很少人读鲁迅先生翻译的《死魂灵》,因为他的译文不太流畅,读起来觉得累,但是,鲁迅先生自己写的小说,用同样的语言,绝对不能说写得不够流畅。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翻译带给我们的感受,但我想,为什么我们看不懂《红楼梦》从来不怪曹雪芹,看不懂《死魂灵》却要怪鲁迅?

很多年前,我去莫斯科参加翻译家大会,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沼野充义在会上发言,题目是《契诃夫在日本》。他说,每过三十年,日本人就要

每个新译本
都有时代性

我们去书店买书,或在网上买书,如果买的是中国作家的作品,那么一定会注意作者是谁,是莫言、余华还是刘慈欣。但是,在买列夫·托尔斯泰作品的时候,会注意到译者是谁,还是刘辽逸吗?我想有人会注意,但这样的人往往是研究俄国文学的学者,或翻译圈的人,而普通读者看到的只是“列夫·托尔斯泰”。

问题是,以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为例,在中国至少有二十个译本,几乎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的翻译特性,该如何选择呢?当然,一个好的译者,他的翻译跟原作的差异应该不大,译者不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,译者的语言风格就是原作的语言风格,但是,译者的文字有好有坏,在某些遣词造句上有他的独创性。

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《文学翻译的几个悖论》,谈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——几个大语种的外国文学,都有自己的翻译传统,不看封面的话,只要翻开一本书,大致就能断定这是俄语文学、法语文学,或是日语文学。这样的风格,到底是原语种文学本身

李淼访谈
专注擅长的领域
会产生巨大能量

记者:二十几年来,您的科普创作没有一成不变,而是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和风格来挑战自我。能否谈谈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?

李淼:早期,我的科普作品基本是纯文字搭配一些插图,偏重知识讲解;后来,我开始给孩子们讲述现代物理科学,比如量子力学,作品里的插图就多了些;再往后,为了让孩子更贴近孩子,我开始创作绘本。我觉得,既然是给孩子们做科普,就应该用孩子们最乐于接受的形式。于是,我创作了绘本作品《这是一个好问题》,一套两本,故事性很强。那时我是个新手,不知道如何将文字和图画结合。我和插画师反复沟通,想找到既能表达科学概念,又能吸引孩子们注意力的呈现方式。

记者:请您谈谈《大闹物理天宫》的特点和创作过程。

李淼:在《这是一个好问题》出版之后,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邀请我创作一部新作,于是就有了《大闹物理天宫》。这部作品在形式上更加幽默了,跟以前的套路也不一样,核心内容的区别也挺大的。我以前写的科普书,要么就是由一个的一个的单个问题组成,要么就是由一个的一个的单个问题组成,而《大闹物理天宫》则是一部系统性的科普作品,覆盖了中学物理知识,由浅及深,逐步推进。我把物理知识融入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框架中,让孙悟空、猪八戒这些孩子们熟悉的角色,在冒险中学物理。为了让故事更有趣,我还加入了很多搞笑的对话和情节。创作这套作品,我用了多半年的时间。可以说并不轻松,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,基本都在构思和写作。有时半夜想到一个好点子,就会立刻爬起来,记下来,担心早晨起来记不清了。

记者:现在人工智能备受关注,但普通受众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,您会写这方面的科普文章吗?

李淼:我接到过这类科普写作的邀约,但到底写还是不行,我还在考虑中。人工智能不是我的专业,这个挑战太大了,所以要慎重。我也在思考,要用什么样的故事和比喻,才能让大众理解复杂的算法和模型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兴奋起来,说不定也就动笔了。

记者:作为物理学家和科普作家,您对青少年学科学有什么建议?

李淼:想怎么干,就去干。不要被太多的外界因素束缚,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兴趣。热爱一件事,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,而且这种热爱往往与个人的能力和特长相关。没有能力,也很难真正热爱一件事,所以要去寻找自己擅长并热爱的领域。比如我,就是在不断探索中发现了科研和科普的乐趣,所以,即使遇到阻力,只要想到这是自己热爱的事业,心里就会充满动力。

(图片由李淼提供)

译者语言如同散文
那些文字源远流长

郭宏安先生的文字非常讲究。记得有一次,我乘坐火车去参加学术研讨会。他躺在下铺看《先秦诸子散文选译》,我问他,你一个翻译家,为什么看这本书?他说,汉语实际上就来自诸子散文,“三天不练生手,三天不念口生”,正是这个道理。

他翻译《小王子》时,写着写着,突然有一段文字离题了,谈到沙漠:“沙漠尤其具有一种使人心返回到童年时代、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的神秘。说神秘其实并不神秘,沙漠上月光如水,心垂四野,天地消融在无迹无涯的宇宙之中,人消融在天地、人、天、地三者共为一体,同享无始无终、无差无别之乐。”这不是译者的语言,是他自己的散文。他忍不住要去小王子待过的沙漠,寻找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我看书特别“贪婪”,一目十行,但这次读《小王子》,我有意放慢速度,越看越感动,也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尊敬的兄长郭宏安先生已经不在在了。我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,我想,郭宏安先生和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安托万·德·圣-埃克苏佩里一样,也是不朽的,因为他们的那些文字源远流长。

现在中国读者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,不仅英语好的人多,我还遇到不少年轻朋友,为了读韩国小说而学韩语,为了读日本小说去学日语,我觉得特别好。有人跟我开玩笑说,一边是AI(人工智能)发展,一边是人们的外语水平越来越好,翻译家可能要失业了。我说,至少我感到很高兴,因为这代表了社会进步,是一件大好事。

讲述

重读《老人与海》《小王子》等经典译著

翻译家不翻译就会寝食难安



口述 刘文飞 整理 何玉新

世界名著浩如烟海,好的翻译可以让读者无限接近原作的内核。那么,究竟该如何选择译本?近日在北京首都图书馆,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、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刘文飞,文学译者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许小凡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一起就“爱上名著,从选好译本开始”这一话题举办了一场阅读分享会。

分享会通过近期由十月文艺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、翻译大家翻译的《老人与海》《小王子》《动物农场》《佛兰德斯的狗》《小毛驴之歌》五部经典名著,解析了译作的文学精髓。刘文飞以郭宏安翻译的《小王子》举例:“世界上有太多的玫瑰,但你爱的可能只有一朵,就像小王子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玫瑰一样。”